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原著十讲

杨春贵 主编 周维现 副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 013038423

D616
3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原著十讲

杨春贵 主编 周维现 副主编



北航

C164405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D616

312

CS:8222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著十讲/杨春贵主编,
周维现副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5035-4960-1

I. 中… II. ①杨… ②周…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参考资料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8349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著十讲

责任编辑 王 君 蔡锐华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 巍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本书编写组

主 编	杨春贵（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 主 编	周维现（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直属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
编写组成员	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理文（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侯少文（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 普（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杨信礼（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应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焦佩锋（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博士）

第一讲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与伟大历史转折

——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

(一) 历史转折关头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 /3

(二) 当代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6

(三)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23

第二讲 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33

(一) 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36

(二) 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
指导意义 /46

(三)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60

第三讲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67

(一)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
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69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74

(三)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81

第四讲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学习《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89

- (一)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述 /92
- (二)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 /99
- (三)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110
- (四) 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117

第五讲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宣言书

——学习《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31

- (一)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34
- (二) 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44
- (三) 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 /153
- (四)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160
- (五) 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166

第六讲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学习《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71

- (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 /173
- (二)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84
- (三)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0

第七讲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学习《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199

- (一) 十五大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新概括和新阐述 /201
- (二)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210
- (三) 努力把握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215

第八讲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学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227

- (一)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29
- (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39
- (三)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243

第九讲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学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49

- (一)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51
- (二)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56
- (三)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264

第十讲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269

-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272
-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 and 总任务 /279
- (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284
- (四)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287

后 记 /292

第一讲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与伟大历史转折

——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但是，遇到了阻力，这就是当时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严重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

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12月13日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进而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一）历史转折关头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国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可谓问题成堆成山。粉碎“四人帮”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开启了一道闸门。但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又给尚不明朗的中国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历史转折关头，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首位，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

想的序幕；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1.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纵观历史，中国似乎具有“两个凡是”的深厚传统。

往前追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就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唯上，凡是皇帝说的话都是真理，金口玉言，说啥算啥；再一个就是唯书，凡是圣人的本本，都是真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秀才写文章都得先说：孔子曰，然后自己曰；孔子没曰自己不能曰；孔子没曰你曰了，那是离经叛道。“理”在孔门，后人的使命就是注经解经。所以，唯上就是唯皇帝，唯书就是唯圣人，唯上唯书不唯实。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五四运动批判了“圣人”，封建社会的“两个凡是”被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但是，“两个凡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终结，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即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用延安整风中博古同志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因为我们当时认为，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还是“两个凡是”，唯“上”就是唯共产国际，唯“书”就是唯马列的本本，不唯实，就是不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破除了王明的“两个凡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可是，到了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即对毛泽东和本本搞“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按照“两个凡是”，就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不能为“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经毛泽东批准的刘少奇冤案、彭德怀冤案、彭罗陆杨冤案、“三家村”冤

案等等冤假错案平反，也不能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事件平反。正如邓小平所说，“‘两个凡是’的论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①

“两个凡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它的提出，阻碍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阻碍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阻碍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我国社会出现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2.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尚未拨乱反正，“两个凡是”又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科学态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胆略，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第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 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②。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一是“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

^①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1977年4月10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确，没有这回事”，^①“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②二是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③三是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④“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⑤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第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

①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②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③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④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⑤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① 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成为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3. 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呼声，也有力地冲击着“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如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干部路线是非问题，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问题，“十七年”的评价问题，农村“三自一包”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如何认识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问题，等等，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之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都遇到“两个凡是”的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标准之争先于理论而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在广泛地进行。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1) 实践的呼唤与理论的回应。

历史呼唤实践标准，理论界及时回应了实践的呼唤。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策源地。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于1977年3月初确定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这是胡耀邦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在筹备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过程中，1977年6月4日，胡耀邦组建了一个“理论动态组”，并决定创办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出刊，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亲自定稿。创刊之初发表的拨乱反正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对待是

^①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2、45页。

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的错误倾向。第31期（1977年12月25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实践标准的第一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胡耀邦审阅定稿的。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通过实践检验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提出要起草一个关于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他设计了框架，并特别指出文件就叫“讨论提要”，1978年1月中旬拿出初稿。在吴江的主持下，研究小组根据胡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于1月中旬写出了第一稿，这个文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突出了实践标准。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第一稿报送胡耀邦。1月20日，胡耀邦审阅了文件，做了如下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充实到30000字”。根据胡耀邦的批示意见，研究小组进一步修改充实了这个文件。同时根据中央党校党委会的建议，吴江于3月6日邀请6位党校学员座谈，这其中包括后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杨西光在发言中同意使用“实践标准”。研究小组再一次修改和充实了文件，1978年4月形成了第二稿，这一稿的名称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这一稿中，实践标准写得更加明确。

1978年4月中旬，中央党校拿出10天时间组织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共807位学员阅读、讨论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重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党校实行了“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讨论相当活跃。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几次到学员支部和学习小组，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中央党校组织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和宣传思想战线的骨干讨论实践标准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意义非同一般，这次讨论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酝酿和

前奏，极大地促进了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解放，使多数同志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掌握了实践标准，不是从文件出发，而是根据实践的结果来思考问题。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暴露出不少糊涂观念。比如，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一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1977年7月，《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到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就约他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9月，胡福明同时投给《光明日报》两篇文稿，其中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1978年1月14日，《光明日报》将胡福明的文稿处理后排成小样，寄给作者。

《人民日报》也遇到了实践标准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一些文章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观点，不断有读者来信指责说，文章所批判的观点毛主席也讲过，认为不应当批判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1978年3月26日刊出。这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进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出后，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①

可见，中央党校、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有代表性的理

① 参见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百年潮》2005年第4期；《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上、下），《同舟共济》2008年第4、5期。亦可参阅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论研究机构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不约而同地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这反映了客观现实的需要。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写作和发表。

中国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到1978年，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问题只在于由谁来打响这一炮，以什么方式来打响这一炮。这就是，要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采取适当的方式发表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应运而生。

1978年4月，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根据中央党校学员在分析和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中所反映的问题，组织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孙长江执笔写出了初稿。这时，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员杨西光，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1978年4月上旬左右，他到《光明日报》上任，报社理论部将拟在“哲学”专刊上发表南京大学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送他审阅。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胡耀邦组织的相关学习和讨论，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主题的重要性，看了胡福明文稿后，提出两条处理意见：一、此文作为“哲学”专刊文章发表，影响小，要作为重头文章在第1版发表；二、文稿分量不够，要作重大修改。他随即与中央党校联系，请中央党校帮助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同意了杨西光的意见。吴江收到《光明日报》的稿子后布置孙长江将两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在1978年4月27日将文章改写出来，送吴江审阅。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样，报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阅圈，表示同意。吴江和孙长江在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又对文稿作了一些修改。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到他家开会，又一次审阅了文稿，对大家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处，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大家都表示同意，作为《理论动态》第60期用稿。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